

中国文库

· 文学类 ·

新月派诗选

(修订版)

蓝棣之 编选



中国出版集团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

国

文

库



ISBN 978-7-02-008534-7



9 787020 085347 >

定价：44.00元

中国文库

文学类

新月派诗选

(修订版)

蓝棣之 编选

中国出版集团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月派诗选(修订版)/蓝棣之编选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1

(中国文库)

ISBN 978-7-02-008534-7

I. ①新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新月派-诗集 IV. ①I2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5478 号

责任编辑:徐广琴

责任校对:常虹

整体设计:翁涌 李梅

责任印制:王铁生

新月派诗选(修订版)

Xinyue Pai Shi Xuan

蓝棣之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3

字数:328 千字 印数:1-500

ISBN 978-7-02-008534-7

定价:44.00 元

“中国文库” 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。这些著作,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,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,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,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人心的作品,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,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,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,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,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,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,总是生命不老,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,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,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,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,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,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,以此获得丰富学养,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,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,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,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,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,披沙拣金、露钞雪纂的刻苦精神,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,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,即:(1)哲学社会科学类

(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);(2)史学类(通史及专史);(3)文学类(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);(4)艺术类(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);(5)科技文化类(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);(6)综合·普及类(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)。计划出版约1000种,分辑出版。自2004年以来,已先后出版四辑,每辑约100种,分精平装两类。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,特将“中国文库”第五辑作为“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”特辑推出,主要收选民国时期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,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,版式有所调整,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,千种书籍,庄谐雅俗有异,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,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,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,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,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基础,并邀约其他数十家出版机构参与,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,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,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,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,顾名思义,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,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,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,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,并将不断地发扬光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“中国文库·第五辑”

编辑委员会

顾 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杲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
宋木文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蔡名照

主 任 聂震宁

副主任 刘伯根

委 员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于殿利 王大可 王兴康 马五一 王明舟 王瑞书 孙月沐
刘晓明 肖启明 李 岩 李 峰 李声笑 吴尚之 罗争玉
徐 岩 吴 斌 吴江江 宋焕起 宋一夫 陈庆辉 林国夫
贺圣遂 贺耀敏 祝君波 陶 骅 郭义强 黄书元 常汝吉
龚 莉 靳立华 樊希安 潘凯雄

“中国文库·第五辑”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 任 刘伯根

副主任 张贤明

成 员 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李 昕 汪家明 林 阳

莫蕴慧 徐 俊 管士光 臧永清

编辑组

乔先彪 唐 俭 何 奎 杜 宇 董 易

印制组

王铁生 兰本立 陆南宸 何 奎 杜 宇

前 言

蓝 棣 之

新月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最长、诗人辈出、有鲜明艺术纲领,并在创作中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一个重要诗派。它活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的诗坛上。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和一股文艺思潮,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现象,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。但是,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永远不会成为“史”的,新月派诗人创作的那些优美诗篇至今仍具有很强的魅力,仍然为广大青年所喜爱。这个选本,既想为文学史家提供一些史料,也想为当今的青年和青年诗人,把那些埋没多年的丰厚遗产发掘出来,以供欣赏和揣摩。自然,关于新月派的评价,至今仍有争议,新月派也自有它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局限。新月派这个称谓就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批评《新月》杂志作者群时所使用的包含着批评意味的名称。新月派的局中人拒不承认他们有“派”,他们争辩说,他们每个人所信奉的主义各不相同,有浪漫主义,有唯美主义,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,有的压根儿就是自由主义。他们争辩说,“派”这顶帽子压在头上,就把他们贬成了社会下层的青红帮那样的黑社会团体了。他们甚至说,狮子老虎都是独来独往的,只有豺狼和狗才是成群结队的。然而,从文学发展过程的事实看,历史地看,他们一群作者无可争议地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艺术倾向,共存在一个文学流派之中,这是不以他们自己的意志或争辩为转移的。我们今天是在文学流派的意义上使用“新月派”这个称谓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

和接近新月派诗歌这份重要遗产,在这篇前言里,准备对新月派的形成和来龙去脉,思想艺术特征,重要诗人的创作成就与局限,以及新月派的文学史地位,作一些必要的描述和分析。我的观点自然只是一家之言,但也考虑了前人的有关论述,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。

一 形成与来龙去脉

新月诗派的活动,时间主要是《晨报·诗镌》创刊的1926年4月至《新月》终刊的1933年6月。作为一种历史现象,新月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新月社的成立。如果从新月派诗人个人的诗歌活动说,那还得追溯到“五四”时期。不过,他们的活动引起社会的注意,还是从《晨报·诗镌》开始的。因此,我对新月派来龙去脉的追溯,就从《诗镌》开始。

《诗镌》周刊在1926年春夏共出十一期,参与活动的有:闻一多和他所称的“四子”——朱湘(子沅)、饶孟侃(子离)、孙大雨(子潜)、杨世恩(子惠),^①徐志摩、刘梦苇、于赓虞、蹇先艾、朱大楠。刘梦苇是朱湘的同乡,于和蹇都是经过刘进入这个圈子的。闻一多1925年夏自美国留学归来,经徐志摩介绍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职务,也因徐志摩的关系,他参与了新月社的一些活动。^②但他和新月社的“高级气派”是格格不入的,“他和新月社甫经接触就引退了”^③,却团结了几个有志于诗的年轻人在家里作诗、谈诗,

① 闻一多《给梁实秋的信》,1926年1月13日:“时相顾从的朋友以‘四子’为最密。”梁锡华《关于新月派》说:“四子”为饶、朱、杨、刘。孙大雨面告本书编者:“四子”应为朱、饶、孙、杨。按:据认为,饶、朱、杨、刘为《诗镌》“四子”,朱、饶、孙、杨为清华“四子”。

② 闻一多《给梁实秋的信》,1926年1月13日:“新月社每两周聚餐一次。志摩也常见。”

③ 梁锡华:《关于新月派》,见香港《明报》,一七三期。

“彼此互相批评作品,讨论学理”。1926年春末,他们中的刘梦苇提出,希望办一个几年前文学研究会办过的“诗”那样的刊物,后商定借《晨报副镌》的版面,派人与该副刊的编辑徐志摩(徐从1925年10月接办《晨报副镌》)交涉,于是才有徐志摩的“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”^①的说法。他加入进来,《诗镌》就这样问世了。

闻一多及“四子”都是清华文学社^②成员。清华文学社是清华学校学生的文学社团,1921年11月成立。^③它的成立受到五四运动后春笋般出现新文学社团这样的风气的影响。清华学校是一所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,是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的“余额”办起来的。一般认为是新月派成员的梁实秋、罗隆基、潘光旦都出自清华学校。《晨报·诗镌》问世时,他们尚在美国留学。清华文学社以诗歌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活动为主要宗旨,如1921年12月的一次常会,讨论过“艺术为艺术呢,还是为人生”这个问题。闻一多曾经对文学社作过《诗的音节的研究》的报告,写过长篇评论《评本学期周刊里的新诗》。文学社筹备印行丛书,印出的第一种丛书是闻一多的《冬夜评论》和梁实秋的《草儿评论》的合集。从成立文学社的经过和情况看,闻一多、梁实秋是主要活动分子和组织者。

徐志摩是新月社的发起人,他1922年10月,在留学美国和英国之后回到北京,发起组织一种雅兴的联络感情和培植势力的聚餐会(在二十年代初期的北京,这种聚餐会以欧美留学生组织得最有特色^④)。他说过:“最初是聚餐会,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,又从

① 徐志摩:《〈诗刊〉弁言》。

② 梁实秋:《谈闻一多》,转引自香港《开卷》,1980年第七期。

③ 见《闻一多全集·年谱》。

④ 梁锡华:《新月社的问题》,见香港《晨报》,一七二期。

新月社产生七号俱乐部”^①。新月社不是政治性的,也不是所谓纯文艺性的,它是带有文化倾向的社交团体。出入其中的是北京的上流人士,组织很松懈。社员有作家、大学教授,也有政治界、实业界和金融界人物,外加几个社员的太太或女友,其中知名人士有:胡适、陈源、林长民、余上沅、丁西林、凌叔华、林徽因、陆小曼等^②。“新月”一词系套用泰戈尔《新月集》。徐志摩本人不希望新月社只是“有产有业阶级的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”,不希望新月社成为“古老的新世界”或“新式的旧世界”。他希望新月社“露棱角”,像罗刹蒂兄妹在艺术界里打开一条新路,或像萧伯纳及其费边社在政治思想界里开辟一条新道^③。可是,这个希望成了泡影,“从新月社产生的七号俱乐部,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!”^④ 1925年欧游回国后,徐志摩对社务兴趣日减,新月社也就步入了死寂,虽然俱乐部门口的牌子一直到1927年才正式除下。徐志摩的希望在新月社落空了,现在又寄托于《晨报·诗镌》。与徐志摩相似,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的通信中,也曾一再表示要领导一种文学潮流。《诗镌》第一次在他面前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可能性。

这样看来,《诗镌》寄托着两位雄心勃勃、希望露棱角、导潮流的诗人的追求,它是清华文学社和新月社的某种演变,是出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的欧美留学生的某种结合。这种以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学背景为基础的结合,对新月派日后的动向有很大影响。如果要问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这种结合以谁为主或者谁向谁靠拢,那么,我们看到,《晨报·诗镌》这块园地是掌握在徐志摩手里,但几乎《诗镌》的全部作者又都在闻一多周围,闻一多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影响都要大一些,加之他性格的“刚”,这种色彩就更鲜明。但

① 见《剧刊始业》。

② 梁锡华:《新月社的问题》,见香港《晨报》,一七二期。

③ 《欧游漫录》,1925年3月14日;西伯利亚,见《晨报副镌》1925年4月2日。

④ 见《剧刊始业》。

是,闻一多的任艺专教务长和加入新月社,换句话说,使闻一多从一个留学生进到“高级气派”的圈子,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,是因徐志摩的介绍而实现的。但这不等于说徐志摩进入闻一多的生活是偶然的,或者闻一多是完全被动的。闻一多九年受清华学校的美式教育,尤其是留美期间所受英美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,都与也曾经在美、英就读多年的徐志摩有不少相通处。照我看,一般地说,闻一多一踏进清华学校以及后来的留美,他长期所受的熏染,他的家校出身,就大致决定了他要走一段新月派道路。徐志摩进入他的生活并与他合作,既是偶然的,也是必然的。归根到底还是时代和阶级地位决定个人的道路。这个道路与同在那个时代,但出生贫苦,身世飘零,而又留日赴苏接触进步思潮的青年的道路,正好是一个对照。

郭沫若说过:“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的。创造社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,语丝派的也是一样。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,……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。”^① 清华文学社成立的那一段,所受创造社影响是明显的。闻一多在“五四”后开始的新诗创作,受到郭沫若《女神》的影响。闻一多在留美期间的通信中,一再说到创造社,把创造社引为同调,希望同创造社合作,并崇拜郭沫若。闻一多和梁实秋都曾经在创造社刊物《创造季刊》上发表诗歌。闻一多把自己关于《女神》的两篇论文送给《创造周刊》发表。他赞扬《女神》的反抗、自由、革命流血的精神和大同色彩,赞扬《女神》的爱国主义精神,只是对《女神》缺乏中国文化的色彩和东方的恬静美有些批评。从这些评论可以鲜明地看到当时闻一多身上的“五四”时代精神。徐志摩也与创造社有过接触;他早期的诗作,与郭沫若曾经同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。他曾经把长篇英文论文寄给创造社刊物。拿梁实秋和朱湘对别的诗

① 《桌子的跳舞》,1928年1月19日,见《文艺论集续集》。

人的评价比较,他们对《女神》的评价是高的。刘梦苇也曾经在《创造季刊》发表诗歌。在文艺思想、观点方面,闻一多与郭沫若早期的见解有些相似。早一点说,他们都认为文艺有很大的社会作用,但又都把文艺本身的目的与它的社会效果分开。郭沫若认为艺术可以统一人们的感情,提高人们的精神,使人们内在的生活美化。闻一多认为艺术是社会需要的,能促进人类的友谊,提高社会的进步程度,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。^①稍后一点,闻一多提出诗人应该是一张唱片,钢针一碰着他就响,他完全是被动的,是不能自主,不能自救的。并说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,主张“艺术为艺术”,说如果目的不在文艺本身,那是对文艺没有诚意;而且同意艺术起源的游戏说,^②闻一多1926年发表的这些观点,与郭沫若1924年以前的文艺观点差不多。那个时候郭沫若认为文艺如春日花草,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,天才的自然流露,并没有所谓目的。他要诗歌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,强调直觉和情感的作用,也接受艺术起源的游戏说。^③但是,郭沫若的文艺观点在1924年以后有了大的转变。这就是说,闻一多1926年创办《诗镌》时的文艺观点,大致上还停留在郭沫若已经自我否定了的那些观点上。而闻一多的文艺观点就是《诗镌》的文艺观点,因此,《诗镌》和创造社,正好形成对立。

《诗镌》于1926年6月10日停刊后,作者们就走散了。于赓虞早就脱离关系而去。蹇先艾转而全力从事小说创作,杨世恩、刘梦苇、朱大楠先后去世。朱湘1929年秋留学归国,就任安徽大学外文系主任。闻一多1927年春曾到武汉短暂地参加过大革命时

① 分别见郭沫若《创造季刊》第一卷第二期《编辑余谈》、《文艺之社会使命》、《三叶集》(与田汉、宗白华通信)和闻一多《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的呼声》,载《清华周刊》一九二期,1920年10月1日。

② 分别见郭沫若《文艺之社会使命》,和闻一多《诗的格律》。

③ 《文艺之社会使命》,1923年5月2日,见《文艺论集》。

代政治部艺术股工作,后来回到吴淞的政治大学。四五月间,政治大学被国民党接收,国家主义这个政团失去了立脚点。1927年秋后,闻一多到南京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。徐志摩1926年秋与陆小曼结婚之后,来到上海。1927年春,胡适之、徐志摩、邵洵美等筹办新月书店,由胡适之任董事长。新月书店创办《新月》月刊,创刊号于1928年3月10日出版。以后又办《诗刊》季刊,出了四期。《新月》二卷二期以后,闻一多辞去编辑职务,赴青岛大学任教。新月书店除了出版两种刊物外,还出版了不少包括新月派成员的作品在内的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文化、创作和翻译等各方面的著作。

《新月》停刊后,一批人在《大公报》开辟《文艺副刊》,1935年11月又辟《文艺副刊·诗刊》,实际上是在继续着新月派的探索。参与活动的有:孙大雨、梁宗岱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俞平伯、朱光潜、废名、林徽因、方令孺、陆志韦、冯至、陈梦家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李广田、林庚、徐芳、孙毓棠、曹葆华等。及到1936年,戴望舒邀请孙大雨、卞之琳、梁宗岱、冯至共同主编的《新诗》杂志创刊后,新月派就与现代派合流了。

二 思想艺术特征

如果把《诗镌》创刊看成是新月派诗歌活动的正式开始,那么,从一开始新月派就打出了反对“感伤主义”和“伪浪漫主义”的旗帜,虽然新月派的诗歌创作仍然受到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,后期创作中也仍有浓重的感伤情调。这时的闻一多已经不同于“《红烛》时代”的闻一多,这时的徐志摩也不是《志摩的诗》时代的徐志摩。闻一多在《〈女神〉的时代精神》中曾经说二十世纪是反抗的世纪,而在诗集《死水》中则要众生“各安其位”;在关于《女神》的论文中曾经要求诗歌反映时代,这时候则把诗人比喻成一张被动的唱片。对于诗集《红烛》中的浪漫伤感,他已经陌生而厌弃了,他说

《红烛》是个“不成器的儿子”^①。他尖锐批评“顾影自怜”、“善病工愁”、“倜傥风姿”、“风流自赏”、“自我的表现”、“多情的眼泪”，说这样的东西在诗中出现是伤感主义或伪浪漫主义。他特别推荐邓以蜚的文章《诗与历史》。邓以蜚认为“如果只在感情的漩涡里沉浮着，旋转着，而没有一个具体的境遇以作知觉依皈的凭借，这样的诗，结果不是无病呻吟，便是言之无物了”。^②徐志摩曾经说诗情像“山洪暴发”，“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，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”。这时候他接受了《诗镌》对于那种单讲“内容”落了恶滥的“生铁门笃儿主义”（按即英语感伤主义的音译）的指责。后来，徐志摩说过，“自我解放”、“自我意识”是从卢梭的言行开始的。从《忏悔录》到法国革命，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，从浪漫主义到尼采（与妥斯陀也夫斯基），从尼采到哈代——在这一百七十年间，“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，脱离了理性的挟制，火焰似的进窜着，在这光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”^③。对于西欧浪漫主义的社会根源和积极的社会作用，他看不到，仿佛只看到了感情失去理性控制这个现象，而这里的理性是什么，那是更值得讨论的。在《白朗宁夫人的情诗》中，他说：“爱是不能没有的，但不能太热了。情感不能不受理性的相当节制与调剂。”^④梁实秋因还在美国留学，没有参加《诗镌》的活动，但他当时在《晨报副镌》发表文章，批评浪漫主义者太贵重人的心，对于自己的生活作不必要的伤感。^⑤后来他又说，文学的力量不在放纵，而在集中和节制。节制就是以理智驾驭情感，以理性节制想象。梁实秋认为感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精髓，他说没有人比卢梭更易

① 见臧克家《海——闻一多先生回忆录》，见《文艺复兴》第三卷五期。

② 见《晨报·诗镌》周刊第二号。

③ 《麦克斯哈代》，见《新月》月刊创刊号。

④ 《白朗宁夫人的情诗》，见《新月》月刊创刊号。

⑤ 《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》，见《晨报副镌》，1926年3月25日。

于被感情所驱使,德国的狂飙运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感主义的混沌,拜伦更有极大的伤感成分。他说的浪漫主义的范围是相当宽的。他说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。《新月》所标榜的“健康”,乃是反对文学中的“感情主义”。^① 饶孟侃在《诗镌》上发表专门评论,指名道姓批评创造社的“感伤主义”。他说:“感伤主义是现在新诗里一个绝大危险。”并阐述说,因为作者“受了社会上许多的苦恼欺骗,便假定人世即是变相的罪恶窟穴,所以他故意用主观的调儿把肉欲、虚伪、丑恶一起和盘托出,表示他自己的胆识与真诚”。饶孟侃认为这是“无病呻吟”,并且说,“差不多新诗的总数,十成中就有八九成是受感伤主义这怪物的支配”,“近年来感伤主义繁殖得这样快,创造社实在也该负一部分的责任”。^② 反对感伤主义,认为过分的感情是不健康的,主张以理性节制感情,并且认为从个人的感情到对旧社会的揭露抨击都在节制之列。新月派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对西欧文艺思潮的演变的看法,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中国文坛的看法,也反映了他们的意识形态。

既然反对感伤主义不单是个文艺观点问题,还包含着新月派对时代潮流和文学潮流的看法,而且是决定于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,那么,在诗歌创作上就不能不打下它的深刻烙印。让我们首先看看“感伤主义”者在《诗镌》内部的境遇。于赓虞说:“在那些朋友中,说我的情调未免过于感伤,而感伤无论是否出自内心,就是不健康的情调,就是无病呻吟。”^③ 因为对此不满,于赓虞在《诗镌》上发表了《晨曦之前》等四首诗后,就与诗绝了缘。于赓虞说他受了社会惨酷的迫害,满头血水,生活极度不安,他用诗来表现悲惨的生活,寄托苦闷的思想,认定诗就是生命。他的诗确是有些悲苦

① 《文学的纪律》,见《新月》月刊创刊号。

② 《感伤主义与创造社》,见《诗镌》周刊第十一号。

③ 于赓虞《世纪的脸·序语》。